



精英讲诚信 政治重承诺

■ 本报评论员:余凡

迈入2023年,虽然离全国总统大选的日子还久,但因个别候选人的热身活动,加上各家民调争逐,吸引了舆论的关注。根据今年初各民意机构测试,民调排名前5名的是甘查尔(Ganjar Pranowo)、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阿尼斯(Anies Baswedan)、利度万(Ridwan Kamil)和埃里克(Erick Thohir),但有些精英还未获政党正式提名。

接近2024选举年,国内“政治明星”效应逐渐升温,各种政治演练和招式纷纷登场,伴随着各种传言。其中关于帕拉波沃、乌诺及阿尼斯间的“政治协议”最热门。

大印尼党(Gerindra)监事会副主席乌诺(Sandiaga Uno)于1月30日在总统宫行政区面对媒体时,突然重

提阿尼斯与帕拉波沃之间的政治默契。指明那份约定书由法德利(Fadli Zon)手书,由帕拉波沃、阿尼斯及他本人签名。“那是手抄本。我认为帕拉波沃考虑到国家及民族的利益,以及对我们两人当时竞选省长的愿望与要求。”

乌诺声明,他与阿尼斯是于2016年9月,向雅加达选举委员会(KPU)登记正式参选雅京省长前签署协议的。“那份约定书是真实的,我记得是由我们三人在印花上签名。”但他不愿透露其中内容,他认为,应该由协议书的持有者向社会公开宣示。

《罗盘网》于30日报道,前雅京省长阿尼斯的发言人沙益(Sudirman Said)在当格朗(Tangerang)向媒体表示,阿尼斯于2017年竞选雅加达省长时向帕拉波沃借用的款项已经算清了,但他没有说明借了多少

钱。“因为当时阿尼斯缺乏竞选经费。”

接着,沙益还说,在2017年的省长竞选中,阿尼斯与乌诺搭档顺利胜选,借款就清了。“因为约定中说明,如果竞选成功,该笔借款就清零了,当作共同竞选时的支出。”此外,关于角逐总统宝座一事,阿尼斯并没有与帕拉波沃达成任何承诺及约定。

沙益重申,反而是帕拉波沃在竞选2019年总统时,想争取阿尼斯的支持。“我曾协助帕拉波沃,询问阿尼斯是否有意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虽然他屡次向阿尼斯提起关于帕拉波沃副座的建议,但当时均被婉言拒绝,因为阿尼斯更想继续当雅加达省长,“那笔借款已经算清了,我不知道乌诺所提的是什么约定,但愿是他记错了。”

另一方面,当乌诺在雅加达被记者问及与阿尼斯

的约定书及2024年总统选举的承诺时说:“回应大家提问,我认为最好由掌握该协议的人士出面说明。不过,当时的确需要签署约定,以便能在未来面对问题时大家有统一的认知。”当被问及那份约定书是否还有效?乌诺强调,倘若双方没有结束的意愿,相关协议至今应该还有效。“我肯定遵守,至今为止。因为我参与签名,至于其他方面,大家可以询问。”

《讲坛网》(TRIBUN.COM)于2月4日消息,从业党副主席埃文(Erwin Aksa)在费沙尔(Akbar Faizal)的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阿尼斯还有向乌诺借用的500亿印尼盾未付清,那是2017年竞选雅京省长时需要的,因为在首轮投票后的成绩很不理想。

埃文说,当时乌诺粮草充足,“因为具备资源的是乌诺,所以答应把钱借给阿尼斯作为竞选经费。”“总数

是多少呢?可能有500亿盾。”至于前省长是否已经还清该笔借款?“我估计,可能还没有。”他进一步说明,该份合约的草稿是由乌诺的法律顾问依法拟定的,前副总统卡拉(JK)见证了合约的签署,并对双方提出了建议。

《呼声网》(Suara.com)于5日称,为了参加2017年雅京省长竞选,据说阿尼斯签署了3份政治协议。最受关注的是他与大印尼党主席帕拉波沃所签署的协议,决定支持阿尼斯竞选省长。当时,作为副省长候选人,乌诺也在协议上签了名。据乌诺透露,该份协议正本目前可能由大印尼党主要理事苏夫米(Sufmi Dasco Ahmad)所保管。

专家评估,第二份协议注明若帕拉波沃竞选总统宝座,阿尼斯将“全力支持”的承诺。然而,如今阿尼斯却接受民主国民党(Nasdem)阵营的邀约,准备

竞选2024年总统大位。对于阿尼斯是否违背对帕拉波沃的协议,双方均保持沉默,并未公开作出表态。

而第三份协议,则是阿尼斯向乌诺借贷竞选经费的契约。就如埃文所言,为了应付2017年竞选雅京省长的经费,阿尼斯借用500亿盾。借贷协议由利科力(Rikrik)草拟;胜选后,利科力获阿尼斯回报,被委以省营企业Pasar Jaya董事的肥缺。但相关的各方都没有说明真相,费沙尔表示将邀请阿尼斯及其助理接受访谈,澄清传言。

网红政论员阿古斯·玛尔(Agus Mar)在其KBN Nusantara平台发表视频讲话,认为五年前的“政党内幕”被眼前的“政治利益”所撞开了。姑不论谁是谁非,其实,民族精英必须讲诚信,政治尤其重承诺,一切应当以国家大局、民生安泰为根本。

给台湾民进党当头一棒 麦卡锡近期不果窜访台湾

■ 雅加达:啄木鸟

美国最近举行中期选举,经过15轮投票结果才选出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果,共和党的麦卡锡才坐上“议长”的宝座。麦卡锡是美国反华仇华急先锋,比起前“议长”佩洛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动头目。麦卡锡去年担任美国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时曾称,有意在担任议长后赴台访问。台媒此前引述美媒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在为麦卡锡访台做准备,可能在春季成行。

麦卡锡要窜访台湾的消息传出后,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不仅表现出热脸相迎,还称2022年就曾向麦卡锡发出“邀请”。不过,岛内理性舆论指出,麦卡锡访台将会给台湾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众多人士也表示强烈反对。人们对这位反华急先锋麦卡锡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很不买账,认为麦卡锡当选,将步佩洛西的后尘,会更加激烈地进行反中仇华的动作,即将遭受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麦卡锡议长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针刺一样痛苦难熬。

近日,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表题为“反对麦卡锡来台,化解危机人民自救”声明,呼吁全体台湾民众强烈反对麦卡锡赴台制造台海危机,以争取台海和平的一线可能。而在麦卡锡窜访台湾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世界议论纷纷。面对世界各国反对声四起,麦卡锡在面临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不得不在美国国会山庄对媒体二度表示,目前没有排定去台湾的行程。麦卡锡宣布暂时不窜访台湾的消息传出后,有舆论称,这句话妥妥地给了民进党当局及炒

作此话题的绿营网军“当头一棒”。

同时,大陆也对此表达严正警告。解放军舰机近期在台海周边的活动,也被台媒解读是针对麦卡锡将访台的反制措施。对于麦卡锡可能访台的传闻,岛内许多人担忧此举恐让台海紧张再度升温。蔡英文近日还称“有决心和能力保卫家园”。对此,台北中天新闻网2日进行街访,岛内年轻人一面倒,认为“蔡英文话不要说太死”“真的打起来了,可能真的变炮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中国14亿人民的震撼世界的声音,把台独头目蔡英文吓破了胆,也让麦卡锡怕得睡不着觉!

麦卡锡目前没有计划窜访台湾,不表示他永远放弃窜访台湾,他是阴谋打算的。首先是“缓兵之计”。他知道,2022年在峇厘G20峰会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来中国访问,不敢轻易破坏中美两国“小阳春”的氛围;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麦卡锡窜访台湾已有高度准备。如果麦卡锡狗胆窜台,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加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民坚决反对麦卡锡窜台的阴谋,风起云涌的反美高潮,将大大动摇拜登摇摇欲坠的反动霸权政府!

等到时机成熟,麦卡锡一定会卷土重来,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轻易放松警惕,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壮大永不死心,美国的“双重标准”、和拜登的“五不四不意”是靠不住的,他们诡计多端,我们不能再上他们的当,要永远保持高度警惕,中国神圣的疆土一寸也不容分割!



纳塔奈尔·伊斯坎达尔 陈源长

在商业,政治,基础设施规划,尤其是建设规划领域,人口学都能发挥其作用,提供有用信息。人口学的分析能告诉我们有关消费者和开发生产者的数据,包括其人数、年龄、性别、居住地址、教育水平、工作地址等相关信息。经济学家维佐约·尼迪萨斯特罗教授(Widjojo Ni-

tisastro)是印尼首位意识到人口学变量在新秩序时代建设规划中的重要性的人口学家。他以1961年人口普查为基础,制定了五年建设规划。1961年人口普查是继印尼独立后的第一次全面性的人口普查,也是印尼人口统计数据的历史里程碑,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维佐约教授指出人口有三个方面会影响到印尼的经济从逆境中复苏,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增长率高(1961-1971年期间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2.1%)、抚养比率高(1971年,每100个劳动力养74人)、爪哇岛和外爪哇岛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64.2%的人口居住在爪哇岛)。

在上述时期,印尼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反映在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145例死亡个案。事实上,每一位印尼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也足够多,多达5到6胎。因此,必须提供价格合理且类型丰富的计划生

育工具来应对这一人口挑战。避孕措施的实施还需要和其他建设规划一同进行,例如提高妇女就业率,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水平,以及通过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而维佐约·尼迪萨斯特罗教授的研究由三位华裔人口学家继续完成:纳塔奈尔·伊斯坎达尔教授(Nathanael Iskandar)、梅玲·黄-加尔丁纳教授(Mayling Oey-Gardiner)和阿里斯·阿南塔教授(Aris Ananta)。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年代,都加盟在印尼大学经济学系(FEUI),这正是人口分析学的历史起点。本文重点讨论以上三位教授在人口分析学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印尼建设规划中所起的作用。

纳塔奈尔·伊斯坎达尔:

■ 棉兰:晓杨

每年的春节期间都会流传一首贺年歌曲《恭喜恭喜》,歌词是:“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每逢过年只要华人家庭里都会响起这段熟悉的旋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拜年歌曲,而是一首抗日歌曲。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著名音乐家陈歌辛有感而发,以“余庆”为笔名,作词作曲,写出了这首《恭喜恭喜》。歌曲最初并非为了传递新年的祝福,而是意在抒发抗战胜利后犹如春天将至,人们互道祝福的欣悦心情。

歌曲发表时恰逢1946年农历新年前夕,因此被民众视为“贺年歌”传颂至今。在原版歌曲以中速进行,采用了略显忧伤的小调。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歌曲速度明显加快,使用了多种乐器,营造出了喧闹、热烈的节日气氛,已变为新年时全世界华人互相问候、传递祝福的一份享受。

歌曲原唱者由姚敏、姚莉兄妹演唱。歌词“皓冰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炼,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仔细听歌词,如长夜、困难、磨炼,都能看出它最初并不是为了新年而作,反复强调的“恭喜恭喜”,其实是“恭喜我们还活着”。由于歌曲中并未提到战争,还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时代的推移,庆祝战争胜利的成分逐渐淡化,“贺年”的意义渐渐被突出强化。

《何日君再来》曾经被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列入“禁歌”。民国政府将《何日

追本溯源

酒廊歌厅经常走红的《何日君再来》是一首歌女不舍得客户离开依依不舍的忧伤之情,牢牢抚君怀的缠绵悱恻吗?调作曲家刘雪庵谱写的《何日君再来》这首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原本是1936年7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7届学生自治会为先期离校的第4届本师毕业班的同学举行茶话会演奏一首音乐作品留作纪念,刘雪庵油然而升起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便当场挥笔创作了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俄籍女同学戈拉当即在钢琴上试奏,那节奏明快、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顿时使大家陶醉了。茶话会就在这首欢快惜别的乐曲中结束。这首探戈舞曲也很快成了舞厅里的热门伴奏舞曲。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的歌舞片由周璇等人担任主演,导演方沛霖特别邀请刘雪庵为该片配乐,刘雪庵了解此片的描写,认为即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舞曲很适合《三星伴月》剧中的情境和气氛,方沛霖请黄嘉漠填了歌词,上海百代公司的法国经济人戴高乐、德累,瞄上了这首歌的市场效应,与刘雪庵签订合同,将《何日君再来》灌成唱片,到处发行,很快走出了上海。1938年蔡楚生导演还将《何日君再来》用在香港拍摄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剧中人在这首旋律中表示欢迎新四军早日归来。《何日君再来》当时已成为沦陷区人民祈求和平和企盼解放的日子到来。这首歌变味源于日本人的翻唱。

《何日君再来》曾经被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列入“禁歌”。民国政府将《何日

军再来》谐音化为“贺日军再来”,一度禁止播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把这首歌看成是上海堕落生活方式写照,并指为“何日日军再来”,列为卖国歌曲。1957年作曲家刘雪庵更因《何日君再来》被划为“右派”,1982年,中国大陆当局又把这首歌视为“不正确的歌曲,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东西”、“黄色歌曲”,同时亦以防止对民众造成精神污染为由禁止输入播放。1937年周璇为这首歌曲在中国打开了知名度;李香兰将这首歌曲唱红了;1967年邓丽君将原曲重新填词,以《几时你回来》的歌名来发表,70年代末期台湾当局对许多禁令逐渐松绑,多首曾经遭冻结的歌曲逐渐浮上台面。1978年邓丽君挑选了《何日君再来》重新诠释,将冗长的修剪成精简适中受人喜爱倍加,再度掀起了热潮。

由殷正祥、韦秀娟、赵元任、廖昌永、沈洋、斯义桂、温可铮等人演唱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乍看之下是怀念恋人的情歌,实际上是刘半农在1920年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所作,是中国早期广为流传的重要诗篇,该诗由于音韵和谐,语言流畅,1926年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广为传唱。刘半农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一度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致力于语言学,此时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感情深沉的诗。诗人表达的是爱国之情,而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思念情人的情歌。

人口学家 (1)

埃菲·努尔斐迪亚·阿莉芬(EVI NURVIDYA ARIFIN)

人口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

在制定五年建设规划时,维佐约·尼迪萨斯特罗教授并不是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参与了此项规划的准备和制定过程。其中一位便是纳塔奈尔·伊斯坎达尔教授(Nathanael Iskandar,中文名Tan Goan Tiang陈源长)。

伊斯坎达尔教授是印尼大学经济学院人口学研究所(Lembaga Demografi Fakultas Ekonomi Universitas Indonesia,简称LD-FEUI)创始人之一。该研究所于1964年10月1日成立,其他创始人分别为维佐约·尼迪萨斯特罗、卡托诺·古纳万(Kartono Gunawan)和卡托诺·维罗苏哈佐(Kartono Wirosohardjo)。研究所的成立起源于一场由印尼

大学经济学院的社会与经济研究所(Lembaga Penyelidikan Ekonomi dan Masyarakat,简称LPEM)的研讨会。伊斯坎达尔教授成为了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从此,伊斯坎达尔教授一直致力于人口学研究,苦心孤诣,直到于1977年11月1日逝世。

当维佐约教授任职于国家发展规划局(Bappenas)时,伊斯坎达尔教授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并协助提供人口学方面的数据。伊斯坎达尔教授还撰写了《印尼人口专题研究》(Some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in Indonesia)一书,并根据196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预测。该书由印尼大学经济学院人口统计学研究所于1970年

出版,对建设规划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他的人口预测,伊斯坎达尔教授提出了三种情况。第一,总人口数呈“高增长”,在1961-2001年期间生育率变化不大以及1976年后死亡率下降;第二,总人口数呈“中增长”,生育率和死亡率在这段时间变化都不大;第三,人口总数将实现“低增长”,如果计划生育(Program Keluarga Berencana)进展顺利,1971年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将降低。在上述三种情况中,他预测2001年印尼总人口数,基于“高增长”将达到2.82亿,在“中速增长”下会达到2.635亿,“低增长”则会达到2.198亿。事实上,在2000年,印尼总人口只有2.058亿,与伊斯坎达尔教授所预测的最乐观的情况差距很大。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